

冯兰瑞



经济论文选

上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冯兰瑞经济论文选

下 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彤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董永亭

冯兰瑞经济论文选（上卷·下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east.net.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出版部电话：62630591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永明装订厂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 27.25 印张 650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1887-2/F·1348 （上、下卷）定价：39.6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兰瑞经济论文选/冯兰瑞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12

ISBN7-5058-1887-2

I. 冯… II. 冯… III. ①冯兰瑞—文集②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575 号

序

于克远

我一般不给别人的书写序。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工作不重要。许多同志付出辛勤的劳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出了书，我理应向他们学习，给以某种支持。可实在没有这个时间，不得不向他们表示歉意。可是为冯兰瑞同志的书写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收入这本《冯兰瑞经济论文选》的文章，有许多篇她随时单篇地送给我看过。但这还不是我要写序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在战斗中亲密合作，有与她所写文章有关的许多的事情值得回顾。比较次要的事不说，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得不写的。

首先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收入的关于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文章。现在读者也许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当然之义，写文章阐述这种主张，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退回二十二年，在冯兰瑞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很不相同。也许有人又会说那时“四人帮”已被粉碎，写那样的文章不至于遇到很大的阻力。其实不然。因为那时“两个凡是”还在台上，毛泽东在1974年10月会见丹麦

首相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这一段话当时称之为“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指示”，因此，四人帮中的“理论家”们说按劳分配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样的话，不是没有“最高指示”为根据的。对毛泽东奉行“两个凡是”而又掌握宣传大权的汪东兴1978年5月19日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审慎。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不能这样的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可见当时写按劳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就是在同“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做斗争、突破其控制。许多人还会记得，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有一句描绘当时理论战线状况的话——“经济繁荣，哲学贫困”。那是指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学界举行了多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而哲学界还没有大的动作。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斗争起了主导作用，可是在经济学

方面的斗争，也还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冯兰瑞同志积极地参加了这几次讨论。《论文选》中收入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就是1977年4月她提交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后来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后，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但还不够开放、不够透彻。于是就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写成《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改写过程中冯兰瑞仍是主要的作者之一。这篇文章经邓小平和李先念看过后，没有送给当时在中央掌握宣传大权的汪东兴那里让他们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在1978年5月5日发表了。这时候也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后。《人民日报》上那篇按劳分配的文章成了与真理标准紧密呼应的文章，引起汪东兴的极大的不满。

接着我想讲一点关于《论文选》中第五部分“理论争鸣”中的第一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这篇文章应该受到读者们的特别重视，不要把它当作一般的文章轻轻放过。我认为这是我为这本文集写序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篇文章是冯兰瑞和另一位经济学家苏绍智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经济研究》编辑部的负责同志认为很好，拿去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认为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一篇具有很重要意义的文章。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恰当地估计我国的现状，而且引证毛

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的用语，很稳重地立论。读者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料被认为这是否认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严重政治错误，布置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而且不许进行反批评，甚至内部刊物也不许反批评。于是引起一场风波。冯兰瑞是这场“阶段风波”的当事者。她是最有资格来讲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有关人物的表现的人。我对那场风波也知道得不少，而我在1981年提出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与那场风波直接有关的。由于1981年有人要把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去，我才强调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为之力争。其实她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我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回事。我只觉得“初级阶段”这个术语要好一些。而且由于那场风波，她没有机会像我那样展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在中央的文件中未能做到把她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几个字写进去，这件事说来话长，不适合在这样的一篇序言中细讲。

我想说一下《论文选》中收入最多的那些文章。在《论文选》的前言中，冯兰瑞说她自己多年来主要的研究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包括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劳动者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属于我说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范围。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已有四十五

年，原来是接受党中央交下的任务写一部教科书，后来想写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门著作。但这项工作至今未能完成。多年来写出了二百来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六卷，现在仍在继续探索中。不过冯兰瑞的研究不但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在理论上早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她就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在这个全会的决议提出劳动力不是商品后她仍坚持这个观点。党中央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同时她对当代中国经济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她认为中国存在的劳动就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而且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她对我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有仔细的客观的研究。多年的研究使她成了这些方面的专家。而我则没有去研究这个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我只是想再研究一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又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划出一个初级阶段，有利于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认识。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够。我希望冯兰瑞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继续研究，这对于她深入考虑按劳分配与工资、劳动就业以及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大有裨益。我也愿意找机会同她交换意见，展开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95年冯兰瑞同志的朋友们为她编写了一本书稿《经济学家冯兰瑞》。收入这本书稿的有顾榴珍同志写的冯兰瑞同志的传略《成功的中国女士》，可惜只写到

1986年；有储凤梧、何清涟、李鹰、振云、何玉林、柳可白、高路、萧灼基写冯兰瑞的文章，还收有她的文章目录。我见到书稿也写了一段贺词，我就把这段贺词全文抄在下面，作为这个序言的结尾。但需要在这里说明一点，那就是贺词中写“她是一九八一年最早提出在我国实行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是一次厉以宁和我的谈话中向我介绍的。

快到兰瑞同志七十五岁寿辰了，她的朋友们把搜集到的她的传略、对她所作的采访、书评以及近四十年著作的目录，编成这样一本书。我很赞成这件事。当代中国女经济学家中，不论从写作之夥，见解之深刻和敏锐，无有出其右者。加以她又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团联经济学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更为经济学家们所熟和。应该有这样一本书问世。她关心的问题很多。她是一九八一年最早提出应在我国实行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她一直关心劳动问题。近年来更专门致力于劳动保障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成了这个学术领域中的专家。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而有效地继续进行中。她比我年轻，直到现在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我相信过些时候在她的著作目录中将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著作列入。兰瑞同志的工作将会得到社会更多更高的

评价。我祝贺她的生日也祝愿她取得更多更高的成就。

前 言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经济理论工作者。1956年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部四班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时已经36岁。在此之前，我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之所以去学习政治经济学，与我当时的工作有关。1954年我在哈尔滨日报担任总编辑。这是市党委的机关报，宣传报道的内容远远超出青年团报纸的范围，包括工业、农业、财贸、基建、公交等等我所不熟悉的东西。我深深感到知识不够，萌发了强烈的学习愿望。这个愿望得到省市领导的支持，于是我到北京考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又从短训班转入理论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制二年。

从1956年我开始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算起，至今也不过43年，其中还要剔除在对外文委的1年和文革10年，所以，真正做经济理论工作的时间前后也不过32年。如果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0岁，这于我已算得是半辈子了。这本书就是从我下半辈子而且只限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的文章中选出的。其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那10年的文章全部在抄家时失去；以前做新闻工作也写过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不属于经济论文而且也没有保留之故。

本书所选文章分为六部分：按劳分配；工资；劳动就业；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理论争鸣；记者访谈。从中不难看出，除理论争鸣部分文章外，主要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包括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劳动者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等等。这一系列研究的起点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批判。

二

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1977~1978年经济学界进行的按劳分配大讨论以及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批判则是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最初突破。我始终是这次大讨论积极的参加者。197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合作）一文，就是在提交大会的书面发言基础上写成的。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由于对讨论起了重要的作用^①，并获得1984年孙冶方经济论文奖。因此收入本书。

经济理论大讨论，开始是维护按劳分配，从理论上驳斥“四人帮”，进一步就发展到具体的贯彻问题，提出了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劳动就业。

研究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不能不联系到劳动就业。早在

^① 此文发表后，政研室送给邓小平看了。邓小平认为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思想还不够放开，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再写一篇更有份量的文章。这就是1978年5月5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和电台广播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来源。这篇文章是林润青负责，集体写作，我只是写作组的一员。——作者注

1979年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次年发表了《劳动就业问题六议》。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下来，直到90年代，陆续发表数十篇讨论劳动就业和失业的文章。其中《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一文反响很大。文章预测，到“九五”末期，我国失业率将达到27.78%，有的报刊评论说“石破惊天”。

因为对失业的理解不同、统计口径不同、计算方法不同，我的数字与统计局的数字有巨大的差距。这一点在1996年和1998年《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文章和通信中已经阐明，并提出改革统计指标和失业率计算方法的建议。

关于劳动力市场，这本是包括在劳动就业研究中的。经济转轨时期，为了突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将有关的9篇文章划出作为第三部分。其所以重要，还由于目前有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是不是商品？怎样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有利于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等等。这些问题不弄清楚，会大大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成长，进一步会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

第四部分的内容是社会保障，也是一个既重要而又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是公民应当平等享受的权利，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里选的文章主要侧重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法制化和有关管理体制的改革。写这些文章主要是出于对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考虑；此外也是当前国企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的需要，最终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三

这本书是笔者近20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近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时期，处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的过程中。在这个大变革时期，理论争鸣的问题很多，关于生产目的、体制改革、双百方针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设等等也是笔者关心和感兴趣的，写过一些文章，这里选了若干篇为第五部分。

记者访谈很多，本书选了3篇，附在最后，供读者参考。

所有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均保持原样。观点前后有些变化，一律不作改动。读者从中可看出笔者研究工作的路子，学术思想发展的脉胳以及研究的方法。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在研究和工作中，努力把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使自己的研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但是，探索中的东西，不免有许多不够成熟，不够全面的地方，希望热心的读者和同行不吝批评和指正。

本书的编辑出版，要感谢李绍光博士和王碧莹同志的帮助，特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尤其难得的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特地在此表示感谢。

冯兰瑞

1999年7月